

中央首长談刘邓問題

揭发批判刘少奇材料汇编

江西农学院《井岡風雷》編

1967年6月

鄧平知
胡崇

PDG

炮打司令部

我的第一張大字報

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的大字報和《人民日報》評論員的評論，写得何等好啊！請同志們重讀一遍這張大字報和這個評論。可是五十多天里，從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領導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動的資產階級立場上，實行資產階級專政，將無產階級轟轟烈烈的文化大革命運動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圍剿革命派，壓制不同意見，實行白色恐怖，自以為得意，長資產階級的威風，滅無產階級的志氣，又何其毒也。聯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實右的錯誤傾向，豈不是可以令人深醒的嗎？

毛澤東

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

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完全拥护毛主席八月五日写的一张大字报。一个共产党员，在大的政治斗争的关键，忘记了群众，忘记了阶级分析，看不见阶级大变动的最新动态，还进行镇压群众，这就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轨道，背离了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同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方针政策背道而驰。这样做不是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而恰恰是会把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引向失败，引向资本主义复辟。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把党的领导从最近一两个月的错误引回到无产阶级正确路线上来，这是党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是国际无产阶级的伟大胜利。马克思曾经说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法国首先发动而由德国来完成，但没有实现。列宁也设想过，社会主义革命可能由俄国首先发动，再由德国、法国、英国来完成，但也沒有实现。现实的历史可否说社会主义革命，由俄国首先发动，而由中国来完成呢？看看现在修正主义在苏联篡党、篡军、篡政，把苏联引向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那里正从革命走向反动，走向列宁、斯大林的背叛。难道这不象人们所说：国际的希望在中国吗？

看种种因素，最关键的问题是因为我们有毛泽东思想的领导。列宁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运动。确实是这样，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我们这样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不怕使我们新中国在世界上建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模范的国家。

现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扫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在我们社会主义道路上的障碍，让毛泽东思想能够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掌握，因而变成更宏伟的力量，我相信能够做到这样，中国的伟大成就将进一步象翻山倒海地惊醒全世界。

陈 伯 达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七日

編 者 說 明

刘少奇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制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疯狂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魁祸首。

大量事实说明：长期以来，刘少奇一直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害怕革命，害怕胜利。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破坏三大改造，鼓吹阶级调和，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利用职权，积极建立资产阶级黑司令部，妄图篡党、篡军、篡政，阴谋复辟资本主义。特别是在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得到了大暴露。他乘毛主席不在北京的机会，在他暂时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抛出了罪恶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妄图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其用心极为恶毒，手段极其残酷。

八届十一中全会宣告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胜利，宣告了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失败。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广大群众的革命热情相结合，就出现了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出现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高潮，敲响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丧钟！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元旦社论中指出：“一九六七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

我们坚决响应这个号召，为了便于继续开展对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群众性的批判，痛打落水狗，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斗倒斗臭，再踏上千万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我们现将收集到的一些材料汇编成册，供大家参考。其中有些材料几经转抄，可能已与原件有所出入，请同志们注意。缺点、错误之处，请同志们指正。

北京大学《12.26》兵团

（通讯地址：北京大学6206信箱）

一九六七年一月

目 录

1. 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 (1)
2. 拥护毛主席的大字报	陈伯达 (2)
3. 中央首长谈刘、邓问题	北京大学《12.26》兵团汇编 (3)
毛主席谈刘、邓问题	(3)
林彪副主席谈刘、邓问题	(3)
周总理谈刘、邓问题	(4)
陈伯达同志谈刘、邓问题	(4)
康生同志谈刘、邓问题	(6)
江青同志谈刘、邓问题	(6)
戚本禹同志谈刘、邓问题	(6)
王力同志谈刘、邓问题	(7)
4. 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 彻底清算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线	高级党校王中、郭丕衡 (9)
5. 刘少奇是中国的赫鲁晓夫	北京大学誓死卫东战斗队 (20)
6. 看，刘少奇的丑恶嘴脸！	清华大学“井冈山”编辑部 (40)
7. 炮打一小撮现代修正主义分子的祖师爷——刘少奇 ——炮轰资产阶级司令部 火烧刘少奇	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 (47)
8. 刘少奇的十大罪状	教育部保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59)
9. 刘少奇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总代表	高级党校校苗等 (61)

附 件:

1. 刘少奇修正主义言论选编	新北大《反修》战斗组 (65)
2. 刘少奇在报刊上发表的言论目录 (1923——1966)	(74)

中央首长談刘、邓問題

毛主席談刘、邓問題

……现在倒開独立王国，許多事情不与我商量，如土地會議，天津講話，山西合作社，否定調查研究，大捧王光美，本来应給中央討論作个决定就好了。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一九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六二年忽然四个副总理，李富春、譚震林、李先念、薄一波到南京来找我，后又到天津，我馬上答应，四个又去了。可邓小平就不来。武昌會議我不滿意，高标准弄得我毫无办法。到北京开会，你們开六天，我要开一天还不行。完不成任务不要紧，不要如丧考妣。

（六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中央政治工作汇报會議上的講話）

……还是二十三条那个时候，北京就是没有办法，中央也是没有办法。去年九、十月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对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吳晗不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沒有人办，现在北京的問題解决了。

（同上）

去年批判吳晗文章，許多同志不去看，不那么管。以前批判武訓传，紅樓夢是个別抓，抓不起来，不全盘抓不行，这个責任在我，个别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是不能解决問題的。这次文化大革命，前几个月，一二三四五月用那么多文章，中央又发了通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么大注意，还是大字报，紅卫兵这么一冲，引起了注意，不注意不行了。

（同上）

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书记处的工作他就抓彭真。你們不說他有能力嗎？（聶荣臻說：这个人很懒。）

（同上）

李富春休息一年，計委誰主持工作我都不知道。富春是守紀律的，有些事对书记处讲了，书记处沒有向我講，邓小平对我是敬而远之。

（同上）

林彪副主席談刘、邓問題

各地的这种情况是有两个方面原因的，一方面固然是本地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央有几个領導同志，就是刘少奇、邓小平同志他們搞了另外一个路綫，同毛主席的路綫相反。刘、邓路綫就是毛主席大字报所說的：“站在反动的资产階級立場上，实行资产階級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階級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

经过这几天，同志們已經比較清楚地知道了这个来源。

（六六年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刘、邓对毛主席思想的传播，所采取的态度，这几天大家知道了，过去宣传部陆定一所采取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那简直是令人愤慨和不能容忍的。

(同上)

周总理谈刘、邓问题

……解放后，党内出现了三次反党集团。第一次是高、饶；第二次是彭、黄、张、周；第三次是彭、陆、罗、杨，现在正在追，要追清楚。……

(六六年八月三十日周总理讲话)

陈伯达同志谈刘、邓问题

十六条纠正了前一阶段错误路线，但是错误的路线是以另外的形式出现，斗争很尖锐、很复杂，斗争一直围绕在群众的问题上。有一些人不执行党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的也即是毛泽东同志的路线，因为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是同部分同志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彻头彻尾的不相容。毛主席提出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是叫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但是错误路线的某些代表人物却反对。他们搬用国民党的“训政”来对抗，把群众当做阿斗，把自己比做诸葛亮，把运动引向相反的道路，这是资产阶级的反动的“文化革命”。

工作组只是一种组织形式，在某种运动中用得适当，是可以的，有的是必要的。但在文化革命中，某些领导人把工作组强加于群众，不过是为了推行他们的路线罢了。但有些反毛泽东思想路线的人，仍用各种方法推行他们的路线，如违反巴黎公社的选举原则，推荐出一个他们理想的“筹委会”“革委会”……，甚至当各地革命师生来见毛主席，也有一部分人跟着来“串连”，企图打击来京的革命师生。九月二十五日，我同文革一些同志接待一批革命师生。我曾有一个建议：不要高干子弟在各校、各单位文革中占有领导地位，最好让给普通工农兵、普干子弟担任。高干子弟把持领导地位是不利的，对无产阶级事业和他们自己都无好处。但如有高干子弟确实很好的，群众选他，我也不反对。但调查材料说，有人听了我的话，很快采取对待措施了。他们说中央已有意指示：高干子弟不作红卫兵领导。于是辞去职务，指定了“立场坚定的人”来担任，花样是很多的，有些同志对这样的花样津津乐道。

毛主席八月五日“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说：“从中央到地方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有人仍然不听毛主席的话，置之不理，你搞你的，我搞我的。这是资产阶级本能在他们头脑行动中起了作用。

(陈伯达同志对两个月运动的总结)

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历来是一、二个人或一个很小集团搞起来的，如陈独秀、李立三、王明等所犯的错误就是少数人搞起来的。这次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在十一中全会上批评过，大多数同志不知道，这次会议就說穿，就是刘、邓，就是刘邓的错误路线。

在怀仁堂的会议，主要是他们两人搞的，北京抓在他们手里，想搞成一个样板，全国照他们的样板去做。很明显，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是占统治地位的。为什么刘、邓路线能在全中国推行呢？这是因为毛主席外出不在北京，是刘、邓利用中央大权在手，篡改了毛主席的正确

路線，提出了一條錯誤路線，不是站在羣眾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立場上，把一場有世界意義的偉大文化大革命的創舉，被劉、鄧搞得冷冷清清。

劉、鄧的辦法是孫中山訓政時期的辦法，派出了大批工作組，把羣眾看成是阿斗，把自己看成是諸葛亮。把一場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搞成全圖按照他們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進行。這條錯誤路線，是劉、鄧聯盟搞的。對劉的錯誤大家了解比較多，而對鄧是不了解的，對他的大字報也不多。其實，鄧的問題是很明顯的，而且也是很嚴重的。工作組的形式便於執行錯誤路線，如王光美到清華，後台的劉少奇，鄧的女兒到師大附中，後台是鄧，劉的女兒劉濤到清華附中，也是有後台的。這裡是挑起了羣眾鬥爭，工作組撤出之後，還是有人操縱的，那裡許多消息比我們還快，他們頑固地掌握學校統治。

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變成了反動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它就要實行殘酷的白色恐怖，有不同意見的人，用各種辦法，把他們打成“右派”或打成“反革命”。清華大學蒯大富，他失掉了自由，要到中央辦公廳來談問題，還有兩個人押着來的。那時主持清華工作的是王光美，後台是劉少奇，把蒯大富打成壞分子、反革命分子，如果那樣搞下去，還有什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呢？這是嚴重違反了毛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正確路線，對全國都有影響的。

鄧是錯誤路線急先鋒，沒有人批評他錯誤的東西。鄧這個人凭他聰明，好象他是天生的百科全書，無所不知，無所不曉，他不作調查研究，竟亂決定問題。

每次開中央會議，他是批評為主，對於其他大事，他是無所用心，對羣眾是不接觸的，對羣眾路線不感興趣的，可是什麼事他都愛“拍板”，總理也只好陪榜。要同鄧談問題比登山還難。

一九六一年冬起草人民公社六十條時，鄧搞南三區，北三區分開搞，也沒和主席商量，主席批評說：“那個皇帝決定的！”這以後陶鑄同志打電話叫北三區的到南三區來開會，而鄧當時坐火車游遍全國，不做調查研究，不了了之。對國際反修作了一些工作，但大致方針都是毛主席主持的，鄧在北京起草了二十五條反修綱領，根本不能用，以後到杭州，主席親自搞了二十五條。

去年起草二十三條時，主席對劉、鄧也批評過，主席批評兩個獨立王國，但沒有觸動他。這次批評錯誤路線還沒觸動他。

劉鄧的思想作風是和毛主席相對抗的，鄧的面貌如果不在我們全黨搞清，那是危險的，他同劉是打着一樣的旗幟。

去年九月中央會議，如果黨中央有一個二個搞修正主義的人，就會把中國變顏色。

蘇共的教訓，只要一變，就會有很多糊里糊塗的人跟着跑。

六二年搞包產到戶也是鄧說的。六三年提出一二三線的問題，主席退到二線，這是組織上的措施。鄧以為大權在手了。全黨占統治地位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但劉鄧利用毛主席休息時把錯誤路線向下推行。有些地方的同志，錯誤路線很適合於他，有的同志世界觀未得到改造好，習慣以勢壓人，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有的是盲目執行了這條錯誤路線。現在只要犯錯誤路線的人回頭，站到正確路線上來就是好的。我們還是要當羣眾的學生，然後再去當先生。我們的年齡也不輕了，不要再跌跤子了，跌了的爬起來再走。劉鄧的錯誤路線在全國是有影響的，但是時間很短，只要毛主席一點破，他們不會得逞的。我們黨占統治地位的還是毛主席的正確路線，我們黨還是興旺的，現在要求我們大多數同志當錯誤路線一指出來，趕緊清醒起來，和錯誤的路線劃清界限。現在劉鄧並沒有承認錯誤，他還想進攻。最近中央組織部的喬明夫同志說，代表中央的是劉鄧彭，還有的人說劉鄧是實力派。

我們这些同志在組織上、工作上必然要和他們发生关系，清醒过来了就好了，我們批判反动的錯誤路綫，要有无产阶级无所畏惧的精神，只要一切为无产阶级事业，我們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毛主席在七大上說过，只要我們一想起先烈，还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馬克思說，无产阶级所丢掉的是压迫我們的鎖鏈，我們丢掉的是思想上的錯誤鎖鏈，这对世界的革命是好事，对个人是好事。现在刘邓还未丢掉錯誤思想的东西，邓这个人更頑固。现在有人說十年以后再討論算帳，这是郑天翔說的。我們这些人年龄老了，更要看破人世，为世界革命有什么不能丢掉的呢？

（陈伯达同志十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

康生同志談刘、邓問題

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魯晓夫，那里是什么共产党员。想把中国变成資本主义，这是个夺权的大問題，那些不給工人办事的全部給他們解散！

刘少奇在六四年到处做报告，是相当严重的問題。今天这个制度（临时工、合同工制度），是关系到我們国家变不变顏色的大問題，是社会主义工厂变不变为資本主义工厂的問題，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修正主义道路的問題，苏联就是一个例子。

（十二月二十六日中央文革小組領導同志接見“全紅總”时的講話）

江青同志談刘、邓問題

现在的合同工制度是刘少奇提倡的，我們不知道，合同工是刘少奇搞的。有人講是主席說要搞的，那只能說是他們的主席，不是我們的主席。……

合同工这个东西，象广播事业局就有五百多个合同工，他們随时可以解雇，一解雇就是資本主义的一套。我們对于坏分子还給他飯吃，让他劳动，而合同工一解雇就沒飯吃了，这样搞培养奴隶主义。……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晚接見北京大中学校革命造反派时的講話）

（关于階級斗争形势，江青同志讲了三次）两条路綫的斗争勝負还没有完。……

（有人提到刘少奇的检查，江青同志說）他的检查不成話的，在干部中沒法通过。全国人民有个認識过程。我对邓小平認識了十几年。对刘少奇是一九六四年認識的，当时，我觉得我們党处在危险之中。那时我听了他的一个报告，七个小时，完全是赫魯晓夫式的报告，他反对毛主席的調查方法，主张王光美的蹲点，王光美的蹲点也是假的。

（提到八月二十四日江青同志曾让陈伯达去制止过貼刘少奇大字报一事时，江青同志說）那是几个月以前啦！你們现在要背对背，不要死揪回来，其他怎么做都可以。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与清华井冈山蒯大富等談話）

戚本禹同志談刘、邓問題

文化大革命是整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什么首先举起革命旗帜的却被打成“反革命”、“游魚”、“牛鬼蛇神”，一个学校整死了許多人……真是白色恐怖，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这不是偶然的，混入党内的一小撮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直反对

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他們就是要在中國搞復辟。如六二年搞單干等。文化革命一開始，姚文元發表文章，結果冷冷清清，不讓搞文化革命，反對文化革命，為什麼社在上海發表。他們就是對和平演變很感興趣，文化領域里帝王將相統治了我們的舞台，我們國家還象什麼樣子？特殊階層，資產階級生活方式……，這樣下去無產階級的國家就要變成資本主義的國家了，學校里也是這樣，各方面向無產階級進攻，真是不要多，少則十几年、几十年，中國一步步就要垮下去了，那時少數人變成貴族，多數人變成奴隸，給他們當牛馬。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北京礦院講話）

（當我們問到為什麼黨團員大多數屬於“保”這方面）他說：根本的原因是北京修正主義路綫的問題，團中央已經修到家了。對黨要分析，黨內鬥爭很尖銳，六二年國家航道要改變了，都是毛主席在堅持鬥爭。你們想一下，那時候快散了，毛主席是中流砥柱，沒有毛主席，就不堪設想。

（六六年十一月十二日於原二司談話）

兩條路綫鬥爭的高潮是在六二年，有人公開提出“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因為他們認為時機成熟了。上次我在二司也講了，如果那時不是毛主席在掌舵，而是他們當權，那我們的紅旗很快就倒了，如果不是由我們的偉大舵手掌舵，而是由過去的大副（劉少奇）掌舵，那我們國家很快就要變色了。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礦業學院的講話）

林彪同志的講話決定印發給紅衛兵學習，那里把劉鄧的資產階級路綫提出來了，所以我可以講這個問題，他們就是黨內的最大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從礦院的鬥爭也可以看出兩條路綫鬥爭的艱巨性，礦院就是個典型。你們要把礦院的鬥爭提到批判劉鄧路綫上來，在礦院的一些，只不過是一些小丑（大笑），不必對他們費那麼大力氣，有人提出要材料，我說材料都在你們這，把轰轰烈烈的羣眾運動搞得冷冷清清，都是劉鄧路綫搞的。如果把各個學校的材料搞出來，是一部很驚險的小說。如清華就是王光美去的，五十天就死人三個人，（原稿如此，疑為自殺了三個人之誤）。王光美是什麼人，是個資產階級分子，他是清華大學文化大革命的幕後指揮。你們看過劉少奇和王光美訪問印尼的電影嗎？（看過了）你們再看看，那才是大毒草，把我們國家的人的面子丟光了，丑態畢露，帶着項鍊，還有那個樣子，看不下去。這樣還不變質啊！早就變質了。這樣的人怎麼能來清華來搞文化大革命呢？光憑這個金項鍊就不能搞革命。你們不是很會寫文章嗎？批判一下。這才是大毒草。他們是一小撮，我們很藐視他們。有毛主席領導，我們只要用一個小指頭就可以把他搥倒，但我們在同他們鬥爭時要重視他，因為他們還有那麼一小撮。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於北京礦院講話）

劉濤可以揭發他老子，大字報可以貼到中南海。誰能進中南海的高干子弟，讓劉濤他們去貼。抄好大字報，貼到外面他看不到，貼到他家去，讓他看。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與清華井岡山剿大富等談話）

王力同志談劉、鄧問題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清華井岡山剿大富等問王力，能否把中央首長對劉少奇的批評交給同學，編入大字報，王力同志說：

“可以交給你們。”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与清华井冈山蒯大富談話）

现在两条路綫斗争的形势很好。中央工作会议开了。最核心的问题是明明白白地提出刘、邓問題。錯誤路綫在我党各条战綫上各个方面的影响、流毒是很深的。目前，应集中目标斗垮，細致地搞，打乱违法乱紀要镇压，不要軟，否則无产阶级大民主就不能保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保证。我們斗反革命小狗腿子，那么創造人就高兴了。

（戚本禹：不要抓小兵，要抓帅。）

（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王力、戚本禹和三司代表座談紀要）

北京大学《12.26》兵团汇编

1967年1月

誓死捍卫毛澤东思想，彻底清算以刘少奇 为代表的修正主义路綫！

王 中、郭丕衡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的問題揭露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曾批判了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綫，这是毛澤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的伟大胜利。这对提高全党的毛澤东思想水平，进一步巩固毛澤东思想在全党、全国的领导地位，挖掉修正主义的根子，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具有深远的伟大意义的。解放以来，我党就存在两条路綫的斗争，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綫，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即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綫。十七年来，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綫不断战胜刘少奇反动路綫的结果。

现在，就手头所掌握的材料，将刘少奇所提出的修正主义路綫揭露如下：

第一、解放战争时期，害怕革命，害怕胜利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转折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指示“战争进程比原来估计大为缩短，现在看来，只需一年左右时间，就可以将国民党反动派打倒。”在这样的形势下，毛主席一再教导全党全民再接再厉，艰苦奋斗，不怕疲劳，不怕减员，不怕受冻受饥，敢于胜利，争取迅速胜利。然而，刘少奇在这样大好形势下，目瞪口呆，害怕群众，一反平常。他在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对马列学院第一期学员说：“现在革命形势发展得很快，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现在不是怕太慢，而是怕太快了，太快了对我们困难很多，不如慢一点我们可以从容准备。”当时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深受三座大山重重压迫和剥削，他们巴不得一下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刘少奇在胜利面前惊慌了，企图拉住革命的车轮不前进，或缓慢前进，集中反映了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情绪。

第二、在三大改造中，企图扭转社会主义方向，幻想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

一、曲解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就是新民主主义时期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我国政权性质的根本改变，标志着我国由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进入社会主义革命阶段。毛主席把这个阶段称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在这个时期里的基本矛盾，毛主席早在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指出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政权必须强化，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刘少奇不承认过渡时期是社会主义阶段，而把它歪曲成

为新民主主义时期。他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中央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講：“现在是三年准备，十年建設时期，待十年建設后，中国面貌焕然一新，社会主义的問題是将来的事情，现在提出过早。”一九五四年九月中国处在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时期，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綫早已提出来了。可是，刘少奇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关于宪法（草案）的說明报告中却公然說：“我国正处在建設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我国这个时期，也叫做新民主主义时期。这个时期，在經濟上的特点，就是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資本主义。”

在这里，刘少奇的思想是一目了然的。他公然宣传什么解放以后不是社会主义革命阶段，而是新民主主义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既有社会主义，又有資本主义。說什么在这个时期，社会主义問題は将来的事情，这不是露骨的資本主义思想又是什么？

二、主张保护富农經濟，发展农村資本主义

解放以后，全国进入了一个土地改革的羣众运动，为了加速恢复农村生产，毛主席早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六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上的报告中就指出：我們对富农的政策，由解放前征收富农多余土地财产的政策改为保存富农經濟的政策。这是毛主席的伟大的策略思想。

然而，刘少奇却把保存富农經濟看成是一个长期的政策，同毛主席思想相对立。他在一九五〇年六月十四日政协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关于土改問題的报告中說：“我們采取的是保护富农經濟的政策，当然不是一种暫时的政策，而是一个长期的政策。这就是說，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保存富农經濟的。只有到这样一种条件成熟，可以大量采用机器耕种，組織集体农场，实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富农經濟的存在方成为沒有必要了，而这还要在相当长的将来，才能做到。”

在这里，可以看出：

（1）他把过渡时期看成是新民主主义阶段；

（2）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也就是說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都要保存富农經濟；

（3）在农场机械化之后，富农經濟才沒有必要；

（4）不是采取革命手段消灭富农經濟，而是用机械化的方法自然而然地代替富农經濟，发展农村資本主义。

这是彻头彻尾的反毛澤东思想。

三、反对三大改造，抵制社会主义革命

土改以后，全国农村普遍出现了农业生产互助組、合作社，毛主席对这些新的事物百倍爱护，积极帮助发展，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作出了决定，要积极领导农村的互助合作运动的发展，逐步地实现农业集体化。可是，刘少奇对这些新事物却采取了老爷式的态度，大加批評指責。如他在一九五一年六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說：“有些同志，认为农村依靠互助組、合作社、代耕队实行农业集体化，实行农村社会主义化，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是錯誤的。农村要实行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工业的发展，不实现工业化，农业根本不可能实现集体化。”又如他在一九五一年馬列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会上，指責报上报导山西省的初級合作社是社会主义萌芽，刘少奇說：“几个初級合作社不能算合作化的萌芽。要合作化，必須象苏联一样，大片大片。要搞合作化，条件不成熟。”在刘少奇看来，沒有农业机械化，不可能有农业集体化。这同毛主席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先搞农业集体化，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思想是根本对立的。毛主席在一九五五年“关于农业合作化問題”的报告中，批判了他的这种錯誤思想。毛主席說：“他們老是站在資产階級、富农

或是具有資本主義自發傾向的富裕中農的立場上替較少的人打主意，而沒有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全體人民打主意。”

一九五四年以後，全國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逐步進入高潮。然而，正在這個時候，劉少奇於一九五四年九月，他在憲法（草案）報告中說：“把第十條第一款改為國家依靠法律保護資本家的生產資料所有權和其他資本所有權。這一款其他資本是指資本家除生產資料以外的其他形式的資本，例如：商業資本。”憲法規定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行利用、限制和改造的政策，但他在憲法報告草案中卻說：“國家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改造將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並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的國家資本主義來實現。”

四、積極推行社會主義經濟靈活性，發展資本主義

一九五六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劉少奇妄想扭轉社會主義方向，保持資本主義私有制的思想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在這種情況下，他又借口蘇聯經濟搞糟了，是因為計劃經濟搞多了，而積極提倡在我國執行社會主義經濟靈活性以發展資本主義。

一九五七年五月七日他指示楊獻珍、侯維煜黨校如何進行整風時說：“蘇聯在這方面的教訓是值得我們注意的，他們只有社會主義的計劃性，只有計劃經濟，因而搞得很呆板，沒有多樣性、靈活性”。“社會主義經濟是各行各業、多種多樣，更要靈活性，如我們的經濟還不如資本主義靈活性、多樣性，而只有呆板性的計劃，那麼還有什麼社會主義優越性呢？”

劉少奇怎樣搞所謂社會主義經濟的靈活性呢？他說：“要利用限制市場私商鑽社會主義的空子，還不止商業有自由市場，還有工業上的地下工廠。另外還要利用農業上的家庭副業……自留地，我們要允許有一部分資本主義商業，地下工廠也要讓他們鑽空子，當他們鑽空子的时候，我們社會主義經濟就立即跟上去，你鑽空子搞這一樣，我們跟上去搶一部分，也搞這一樣。他鑽幾十萬樣，我們社會主義也跟上去搞幾十萬樣。”他說：你們回去要大聲疾呼地提倡，大家注意這個問題。

在這裡，劉少奇完全暴露了他的資產階級思想本質，他惡毒地攻擊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是呆板的，社會主義經濟沒有資本主義經濟優越性大，他公開主張在社會主義國家要允許保留一部分資本主義的商業、工業，甚至允許保留投機倒把的地下工廠，他提倡社會主義經濟的資本主義化的自由競爭，自由發展。他的這一套，完全是反社會主義的，反毛澤東思想的，為已失掉生產資料所有權的資本家效勞，妄想恢復已失去的資本主義陣地。

第三、在所有制改造基本完成之後，竭力宣揚階級鬥爭熄滅論，積極主張階級合作

社會主義三大改造運動在毛主席親自指導下，在較短的時間內，取得基本勝利，接着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最高國務會議上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講話，同年三月十二日，又在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作了講話，指出：“革命時期的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羣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買辦階級的殘余還是存在，資產階級還是存在，小資產階級剛剛在改造，階級鬥爭並沒有結束。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階級鬥爭，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在意識形態方面的階級鬥爭，還是長時期的，曲折的，有時甚至是很激烈的。無產階級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資產階級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觀改造世界。在這一方面，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誰勝誰負的問題還沒有真正解決。”歷史的發展完全證明毛主席的論斷是正確的。可是劉少奇呢，完全同毛主席唱反調，反對毛澤東思想。

一、他认为三大改造以后，階級斗争不存在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誰胜誰負的問題解决了。他在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五日在八大政治报告中說：“改变生产資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而困难的历史任务，在我国已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誰胜誰負的問題已基本解决。在社会主义完成以前，階級斗争仍然繼續存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斗争还会繼續一个很長時間。”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他在上海黨員干部大会上明确的說：“现在国内敌人已基本被消灭，地主階級早已消灭，資產階級已基本被消灭，反革命也基本被消灭，我們說国内主要階級的階級斗争已基本結束了，那就是說敌我矛盾已經基本解决了。”“当革命沒有胜利的时候，我們用革命斗争来考驗，革命胜利以后，革命斗争沒有了，社会主义改造沒有了……，那个階級，那些事情用不着了。”

在这里刘少奇完全违反毛澤东思想，他竭力把毛主席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階級斗争的观点歪曲和捏造成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的斗争，完全抹煞了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的階級斗争，抹煞各派政治力量之間的斗争，抹煞了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在意識形态方面的階級斗争。其目的不过說明社会主义社会不存在階級斗争。

二、他认为在农业合作化中解决了资本主义的自发傾向。

毛主席一再指出：“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仍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間的階級斗争，合作社建立了，还必须經過許多斗争才能使它巩固起来。巩固以后，只要一松劲又可能垮台。”

然而刘少奇认为：“由于党坚定不移执行联合中农的方針，由于中农看到走资本主义道路无望，看到合作社日益显著的优越性，广大中农在合作化的高潮中，終于停止了动摇，积极要求入社了。”（八大政治报告）。事情的发展完全和刘少奇的想法背道而馳。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不但繼續存在，而且一起一伏，有时还相当严重尖銳，我党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不断地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断地对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批判资本主义自发傾向，打击资本主义复辟活动，斗争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才逐渐巩固和发展了农村社会主义陣地。如根据刘少奇的想法，中农没有什么动摇，一部分农民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問題不存在了，这样农村就万事大吉了，不要再搞什么階級斗争，只抓生产就行，如此下去，不要多久，农村就要变顏色，资本主义就要复辟。

三、他认为資產階級本性改变，号召向他們学习。

毛主席指出，資產階級本性不会改变的，只要我們执行正确的政策，資產階級接受我們的政策，无产阶级和資產階級的矛盾不会变成对抗性的矛盾。

可是刘少奇认为，只要我們政策正确，資產階級和无产阶级不会有矛盾，他們会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根本看不到他們反社会主义的一面。他在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說：这个政策（指利用、限制、改造）和这些步骤，不仅得到广大羣众的拥护，而且資本家也找不出任何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来拒絕和反对。现在已經可以断定除开个别的頑固分子想反抗之外，在經濟上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并且逐步轉变为名符其实的劳动者，是絕大多数民族資產階級能够做到的。刘少奇在八大政治报告中，竭力吹嘘資本家的特长和对国家的貢獻，說什么：“資方人員富有管理經驗和技术知識，了解消費者的具体需要，熟悉市场情况，善于精打細算。”說什么解放以后他們“接受工人階級和共产党的領導”“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甚至說什么在过去几年“民族資產階級参加了国民經济恢复工作”，“参加和支持土地改

革、鎮壓反革命，抗美援朝的鬥爭，從而孤立了敵人，增強了革命的力量”。他在一九五七年四月向上海黨員幹部也大講：“公私合營以後，資本家已把工廠交出來了，除極少數分子以外，他們已經不願意反抗社會主義，有很多人已經接受社會主義了，今天資本家是新的資本家了。”因此劉少奇號召黨和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搞好“聯盟”，搞好“關係”，要向他們學習。他在八大政治報告中說：“我們自己除開向他們教育以外，還必須向他們認真地學習，把他們有益的經驗和知識當作一份社會遺產繼承下來”，“我們的任務是繼續改進和他們的合作關係，通過這種聯盟（即工人階級同資本家的聯盟）對他們繼續團結、教育和改造工作。”完全抹煞了工人階級同資本家的根本對立，大講團結工作，不講階級鬥爭，放棄社會主義改造的思想陣地。

四、劉少奇認為革命鬥爭的任務已經結束，現在是需要完備的法制的時代。

劉少奇在八大政治報告中講：革命戰爭時期和全國解放時期，“鬥爭的主要任務是從反動統治下解放人民，從舊的生產關係的束縛下，解放社會生產力，鬥爭的方法是人民羣眾的直接行動，現在革命的暴風驟雨時期已經過去了，新的生產關係已經建立起來，鬥爭的任務已經變為保護社會生產力的順利發展，因此鬥爭的方法也就必須跟隨着改變，完備的法制就是完全必要的了。為了正常的社會生活和社會生產的利益，必須使全國每一個人都明了，並且確信只要他們沒有違反法律，他的公民權利就是有保障的。他就不会受任何機關和任何人侵犯，如果有人非法地侵犯他，國家就必然站出來加以干涉。”

在這裡劉少奇完全斷定了社會主義革命已經完全勝利，“革命鬥爭任務已經結束了”

“人民的直接行動不需要了”，“現在需要的是完備的法制”，階級區分也不要了，對待一切剝削階級和勞動人民都一視同仁，等等，實質上表現了“全民國家”的腔調，取消革命，取消鬥爭，取消人民羣眾運動，這同赫魯曉夫的“全民國家”毫無區別。

五、劉少奇主張用“緩和”“妥協”的方法來解決人民內部矛盾。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主席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光輝著作，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關於無產階級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是進行無產階級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最好武器。然而劉少奇卻歪曲、反對毛主席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思想。

毛主席指出：在我國急風暴雨式的羣眾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但階級鬥爭長期存在，大量存在的是人民內部矛盾，但還存在敵我矛盾。在我們國家，資產階級和工人階級的階級鬥爭，一般地屬於人民內部的階級鬥爭，但也有可能發展為敵我矛盾的階級鬥爭。敵我矛盾和人民內部矛盾，因性質不同，解決方法也不同。敵我矛盾採用專政的手段解決，人民內部矛盾採用民主的方法，也就是採取民主集中制的方法解決。劉少奇有意歪曲主席思想，一九五七年四月他在上海黨員幹部會上講話說：“處理敵我矛盾，要強調鬥爭性，在矛盾緊張起來，使鬥爭激烈化，以至使矛盾的對方壓倒、消滅。如果我們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不是強調同一性，而是強調鬥爭性，使人民內部矛盾沒有必要地緊張起來，激化起來。在人民內部造成緊張局面，那就是錯誤的，那就是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方針錯了。”“人民內部矛盾應該緩和，人民內部矛盾的事情應當妥協解決，處理方針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為它原來就是同一性。”同年五月他同楊獻珍、侯維煜談話也提出“處理對抗性矛盾、敵我矛盾，要採取你死我活的辦法來解決，處理非對抗性矛盾，人民內部矛盾，就不要採取你死我活的辦法來解決，可以用妥協的辦法來解決。”

在這裡，劉少奇根本違反毛主席關於矛盾同一性和鬥爭性的思想，割裂了矛盾的同一性和鬥爭性的辯證關係。宣傳處理敵我矛盾強調鬥爭性，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強調同一性，強調

妥协。他这样讲的实质，就是否认人民内部有阶级矛盾，有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阶级妥协，取消阶级斗争，取消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的本质是革命的、批判的，没有斗争就不成为矛盾，没有斗争性就没有同一性。解决任何矛盾都必须经过斗争，刘少奇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妥协办法的理论，是十足的修正主义理论。

第四、一九六二年抛出右倾机会主义纲领，掀起一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逆流

在一九六〇——一九六一年国际国内阶级敌人利用我们由于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暂时困难，向党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阶级斗争十分尖锐的时候，作为国家主席，党的副主席的刘少奇，不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进行坚决斗争，打退他们的进攻，相反，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提出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和措施，从而助长了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逆流。

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刘少奇主持下制定了一个“中央关于全党干部轮训的决定”，这个决定歪曲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原则，错误地提倡什么自由思想、自由讨论，“三大民主”，而不讲思想斗争。这样为资产阶级思想大开绿灯，使那些对党不满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公开地、合法地、肆无忌惮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

一九六二年一月，刘少奇在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又抛出一篇修正主义报告，在这个报告里，他大肆攻击三面红旗和竭力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他认为我们出现暂时经济困难是由于我们工作中的错误造成的，“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攻击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过火了，反右倾斗争本身就是错误的，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翻案。他诬蔑党内缺乏民主，党的生活就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

接着，他又在一九六二年批转了一个更为错误的《中央财经五人小组向中央的报告》，这个报告竭力夸大我们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对形势作了极为悲观的估计。

这个报告和文件在全党作了认真的传达和学习讨论，影响很坏，造成党内思想混乱，使不少同志一时迷失方向，使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一些牛鬼蛇神纷纷出笼，掀起一股“单干风”和“翻案风”。高级党校一小撮反党黑帮杨献珍、王从吾、侯维煜就是在刘少奇报告的号召下大闹“单干风”“翻案风”的，他们抓住刘少奇的报告，捧为至宝，组织工作人员花一、二个月时间去反复学习、讨论、提意见，为杨献珍翻案，把高级党校闹得乌烟瘴气，成为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障地。

一九六二年九月，中央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伟大领袖毛主席适时地做了关于形势、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报告，揭开了当时存在的严重的阶级斗争的盖子，提出要在全国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扭转了阶级斗争形势，纠正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下，阶级斗争很快就起了变化，工农业生产迅速得到发展，再一次证明了毛泽东思想的光辉和英明伟大正确。

第五、提出形“左”实右的四清路线，和毛主席的四清路线相对抗

一九六三年三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制定了《中央关于目前农村中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正确地提出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根本路线和政策，它是我党在社会主义时期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阶级斗争的根本纲领，是具有很大历史意义的革命文献。全党和全国人民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在《决定》（草案）精神的指导下，全国农村蓬蓬勃勃地开展了社